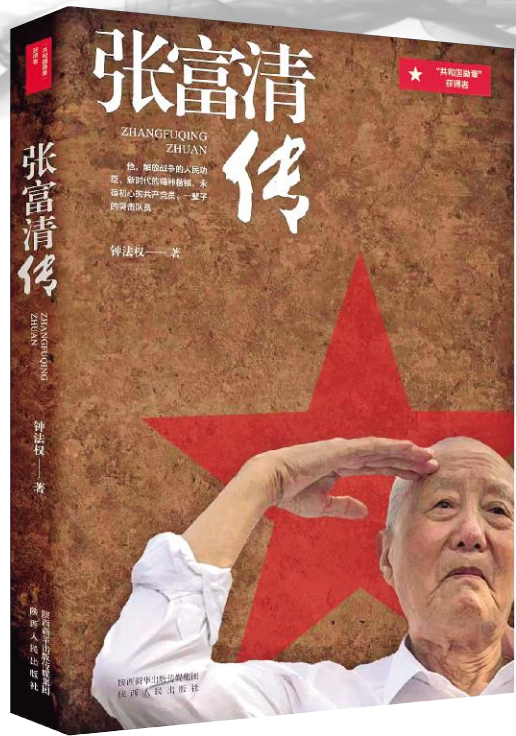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(上接 A06 版)

文化艺术报:您是小说家,报告文学作品《张富清传》获得了鲁迅文学奖,您的小说作品没有获奖,有没有遗憾?

钟法权:首先,报告文学也是文学作品。我认为,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获奖,与小说获奖没有什么差别,不存在谁身价高、谁身价低的问题,关键要看作品的含“金”度,因而也就不存在遗憾。鲁迅写小说,也写散文、杂文和随笔,如果按现在当下的标准给他贴个标签,那他究竟是小说作家,还是散文作家;是杂文家,还是随笔作家?苏东坡(苏轼)的身份是官员,按现在的分类,你说他是官员作家,是诗人,还是散文作家?无论写什么题材,或者被贴上什么标签,归根结底,一个作家要靠作品说话立身,只有写出被读者认可,能够经过时间检验并流传的作品,才不会被人遗忘。说得再朴实一点,如果你确实有文学全才的天赋,你完全可以写出让读者为之叫好的好小说,如此也就有了文化自信,也就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小说家,还是擅长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,或者说在小说家的行列中有无地位。

文化艺术报:您更看重小说家的身份,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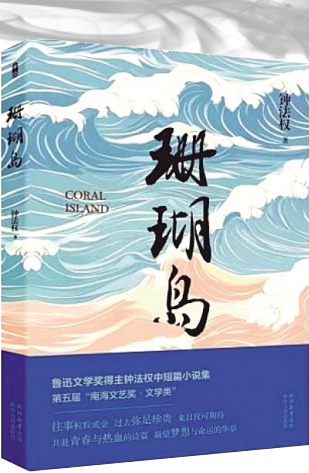
钟法权:前面,我已经讲过,无论是小说,还是报告文学,都是文学创作的分类。小说在虚构的基础上,展开充分的想象空间,实现自己文学意愿的表达;报告文学则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,通过充分的采访,进行文学的组合加工,实现社会价值的表达。前者,需要生活积累,后者需要深入的采访。我虽然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,同样也写了大量的小说,而且文学创作从写小说起步,所以我不太在乎给我冠以小说作家还是报告文学作家的“称号”,我只在乎作品写得好不好,是否被读者认可,是否被历史的时空认可。

文化艺术报:《硝烟中的号角——百战英雄王占山》是您继《张富清传》后的又一力作,该书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一部接一部的英雄形象塑造,是作协指派的任务,还是一个作家的良知?

钟法权:《张富清传》是我主动要写的一个英雄人物,纯粹出于对英雄崇拜的内心驱动,只不过我的想法得到了陕西省作协的大力支持和中国作协的扶持。《硝烟中的号角——百战英雄王占山》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与我共同商讨后确定的选题,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项目扶持。可见,一个优秀的作家,在文学创作上,应该是良知的内驱主动居多,而不是被动地受外力的驱使。惟有如此,不仅可以产生强大的内驱创作动力,还会受到外力积极影响,双向力量的推动,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文化艺术报:您还有一部报告文学作品《为珠峰测高的人们》,这部长篇报告文学,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2021 年第 4 期。写作这样一本书,您都做了哪些准备?

钟法权:《为珠峰测高的人们》是受陕西省作协的指派而展开的文学创作



活动。在写作之前,我对这个老典型了解得并不多,接受写作任务后,我在阅读了关于国测一大队大量先进事迹材料后,这才感到他们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群体,他们用脚丈量祖国大地,一次次把觇标竖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。经过一番仔细研读,我从大量的资料中,找出了自己感兴趣、有书写价值的人和事,并将其一一列出。然后按图索骥,一一进行深入采访。譬如,为写好三测珠峰情未了的郁期青老人,我前后两次到无锡,与他面对面交流,侧耳倾听关于他三测珠峰一生不悔的感人故事。

文化艺术报: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,是您的梦想、情结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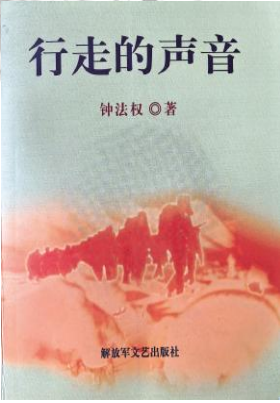
钟法权: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在我的内心确实有那么一股强烈的冲动和创作欲望,要为自己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写一部传记。怀着这份初心,我先是完成了《最先到达的长征》,写完后仍觉不够解渴。2019 年,机会来了,隐藏功名的张富清仿佛横空出世,我主动迎战,集中时间,集中精力,激发写作潜力,在最短的时间里,写出了《张富清传》;时隔两年,又推出了《硝烟中的号角——百战英雄王占山》。《张富清传》让我实现了为英雄立传的梦想,而《硝烟中的号角》则成为孩子们喜爱的读物,从而让我更加坚信,用文字铭记英雄,给人以光亮,才是一个作家实现自我价值的至高境界。

文化艺术报:18 岁那年,您默默吟诵着陆游《秋波媚》的豪壮军旅诗词,从江汉平原应征入伍,来到了北国边陲大兴安岭南的一座军营,从此开始了您的军旅生涯。您的文学梦,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吗?

钟法权:在没有当兵之前,我只是零零星星读过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林海雪原》之类的书籍。参军到部队后,首次踏入部队图书室,琳琅满目的图书,让我眼花缭乱,仿佛置身于书的海洋,面对一柜子的中外名著,我随手抽出一本,竟然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集。正是在读了雪莱的《西风颂》后,我才记住了“如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和“浅水是喧哗的,深水是沉默的”,以及“我们愈是学习,愈觉得自己的贫乏”等名句。后来又读了雪莱《致云雀》《夏日黄昏的墓园》等名篇。受雪莱诗歌的启发,我开始写诗,后来只因为生性不够浪漫且才情不够,最后改写小说和报告文学,开启了一生的文学攀登之旅。

文化艺术报:您的老家在江汉平原,说说您的家乡吧,参军之前的老家生活是怎样的?

钟法权:我的老家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,是一个丘陵与田园、河流与森林兼有的美丽乡村。故乡紧邻秦直道—襄荆古道,自古交通便利,纪山为楚国郢都的后花园和王陵所在地,出土了文化瑰宝楚简。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湖广足天下足,共同构成了让我为之骄傲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自信。因而,即使在那特殊的年代,虽然有吃过饱饭的日子,但少有饥荒之苦。鱼米之乡的灵秀、田园风光的鲜活,构成了我对



故乡最清晰的美好印象。《重生》里的风景描写,本就浑然天成,我只需像松鼠囤积果实般如实记录,根本不用刻意加工和粉饰。

文化艺术报:几十年的军旅生活,对您的生活、创作影响有多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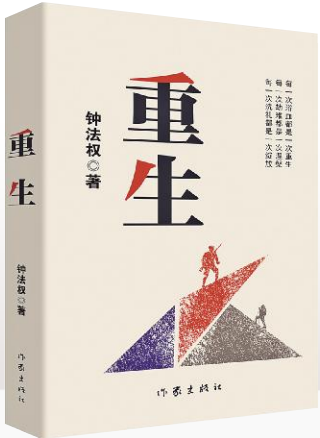
钟法权:38 年的军旅生活,不仅仅是一段人生的经历,重要的是构成了我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,背离熟悉的军营去追逐陌生题材,往往会导致作品缺乏根基,浮光掠影。如果不写自己熟悉的军事题材,而是另辟蹊径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,那样写出来的作品也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。正因为如此,这些年我坚持在军旅生活的纵深处带开掘,以匠人之心深耕细作,力求从这座文学的大山中打出滋养心灵的甘泉。

文化艺术报:军旅题材是您创作的重心?

钟法权:我长期在部队工作,所熟悉的生活,就是军旅生活,因而军旅题材的创作,自始至终都是我创作的重心。鉴于时代发展的需要,要不要调整文学创作的重心,确实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,如何做到在军事题材创作上另辟蹊径,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突破口,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。我想即便是打开了另一扇窗口,军事题材创作依然是自己一个时期内需要坚守的一亩三分地。

文化艺术报:您在一次讲座中谈道,“文学应从阅读开始”,可否谈谈您是如何读书的?

钟法权:读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,没有阅读就没有成长和进步。读书看似简单、随心所欲,其实深藏奥秘。下面我以采访中国科学院鞠躬院士一段关于阅读的故事为例:1957 年初春,鞠躬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,拜访了当年中国神经学界最具权威的臧玉沅先生。他之所以去找臧玉沅先生,是因为他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科研问题需要解决。臧玉沅见了年轻有为又有上进求索心的鞠躬,自然十分高兴,对于他提出的问题不仅一一给予了耐心解答,而且表示在鞠躬未来科学研究的路上将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。最后还一再叮嘱鞠躬,不要局限于神经解剖学教科书的现有知识,也不要专注于书上插图是否好看,要把更多时间花在了解学术杂志上刊登的科研文章上,多留心医学前沿的新信息和新发现。鞠躬听后如醍醐灌顶般茅塞顿开。从北京回到西安后,他便留心学术刊物刊发的科研文章,特别留心关注世界神经解剖最新前沿动态。这一学习方式的转变,为他日后迈入科研的快车道,开了一扇天窗。20 世纪 90 年代,我也曾经到《芳草》杂志编辑



部拜访一位有名的编辑,他也给我提出了多读世界名著的建议,并列了书单。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高度重视,从而在阅读上走了弯路,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。

文化艺术报:还记得处女作吗?

钟法权:一个作家的处女作,就像一个人的初恋,很难让人忘记。1990 年我在《后勤文艺》发表了小小说《猪倌相亲》,这篇不足 1300 字的小小说,在我看来只能算作我文学的发端,真正可以称之为处女作的作品,是 1992 年我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第 9 期上发表的《中尉》,这篇小小说写的是一名中尉养了一只憨、笨、丑、怪的小乌龟,因为一只小乌龟,中尉与战友和女朋友发生了友情和爱情的冲突,体量虽小,却极具意蕴。《中尉》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,原因在于自《中尉》发表后,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先后在《昆仑》发表了《情书撰写人》,在《百花园》发表了《音乐的魅力》,在《长江日报》发表了《得奖的奥秘》,两年之后,我的第一本书《情书撰写人》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。阶段性的文学收获,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,让我坚定地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。

文化艺术报:要是没有写作,生活会是怎样的,会不会有更好的前程?

钟法权:写作是我的爱好,也是我一生的追求。没有写作的生活,我想我的生活是单调、没有色彩的。至于会不会有更好的前程,我想这是一种美好的假设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,命运决定了路的不同。只要是适合自己的路,一条让自己称心的路,一条可以通向理想彼岸的路,也就谈不上遗憾,因为写作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风景和文学的人生。

文化艺术报:家庭对一个作家的成长,有什么影响?

钟法权:家庭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可以说无处不在。譬如,我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,可他特别会讲故事,一旦讲起家史、讲起村史、讲起身边的人,他会滔滔不绝。而我的母亲,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,可她特别擅长借用俗语、谚语之类的话来教育子女,譬如说,教育孩子别脱离现实、想入非非,她会说,命里只有八颗米,走遍天下不满升。譬如说,教育子女要孝敬父母,她会说,犬不择家贫,子不嫌母丑;娘亲有舅,儿亲有叔。再譬如,教育子女别好高骛远,她会说,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。所以,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文化艺术报:不写作的时候,都做些什么?

钟法权:不写作的时候,我会放下



身心,读自己想读的书,与好朋友一起下棋,或者相邀打个牌。这种闲来一身轻的生活,一定是短暂的,如果长期不写作,我会感到空虚无聊。

文化艺术报:写作几十年,也获得了很多荣誉,您对自己的作品和社会认同满意吗?有没有缺憾?

钟法权:在文学创作过程中,能够获得相关荣誉,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和认可,也能让我在成就感的鼓励下坚定前行。几十年的文学创作,写下了大量作品,总体上来说,基本上满意,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认同,于我来说,是一种激励。俗话说,人无完人。文学创作多多少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,有些是天生不足所致,有些是后天悟性欠缺形成,有些是个人的机遇所致。有句话叫,水满则溢,月满则亏。在某种程度上,有缺憾,何尝不是好事。

文化艺术报:后面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,还是报告文学上?

钟法权:近几年,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,除了写一些短篇小说,在完成《重生》后,集中精力创作了《沧海岛》和《苍山如海》两部长篇小说。王宏铭在《红楼有三味》一书中说:“文学是最喜创新的,但它又不能像科学那样沿着物质存在的逻辑向未知领域探索,因而只能在创作手法上求新求异。”19 世纪,欧洲流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,充分体现了深厚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,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等作品,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可是人们总不能只听一个模式的故事,那样就会出现“审美疲劳”。进入 20 世纪,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进入新的世纪,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,受互联网多媒体和人手一部手机的深刻影响,传统纸媒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,文学似乎进入到了不温不火的瓶颈期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应主动顺应时代发展之变、读者阅读习惯之变,写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,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。在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精力投入的选择上,我想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上,我的创作基本思路是,如果遇上有价值、自己感兴趣、适合自己创作的现实题材,我还会写报告文学;如果没有自己想写的报告文学,我将集中精力进行长篇小说创作。一句话,写出好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初心与使命。

文化艺术报:对年轻作者,有话要说吗?

钟法权:北宋思想家张载有“横渠四句”——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这四句听起来绝对的崇高,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,“为往圣继绝学”还是有点高大,容易让人误入理想的盲区。一个作家,既要仰望星空,还需脚踏实地;既要锲而不舍,还需量力而行。我在《沧海岛》后记《那片蓝色的海洋》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妨拿出来与年轻作家共勉:文学创作是一种永无止尽的求索,既要有一双超凡脱俗的慧眼,还要有写绝世之书的雄心,更要有一颗出世的心态。因为,写作就好比农民种地,能否有一个好收成,那就看播下的种子、生长的土壤、气候的好坏等因素,唯有以淡泊之心看待,把收获的事情交给土地。

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
(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